

相思与君绝



「台湾」章容裴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「台灣」章容裴著

9 4 5 *

相思与君绝

(浙)新登字第 4 号

责任编辑 陈云生

封面设计 张妙夫

相思与君绝

章容裴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浙江桐庐印刷厂印刷
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25000 印数 0001—10000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339—0840—6/I·771 定 价:7.40 元

时 间：一九八八年四月三日。

地 点：桃园中正国际机场。

登场人物：新婚三个月半的夫婿童。

喜孜孜地抱着童大哥儿子的童母。

拿着相机四处猎取镜头的童二哥。

凄凄惶惶的娘。

眉头深锁的弟。

我。

P. S.

小心翼翼地许多心情束之高阁，既然踏上别人的国土，就得强迫自己只留下忍耐与毅力这两个说得容易实践难的好兄弟，其他的先囤积起来，待有空时再拿出来反刍。

当然“寂寞”这玩意享受治外法权，你是拿它没辙的。

1

我进的是日本国立熊本大学文学研究科国文学系比较文学讲座。

进硕士班之前，学校规定必须先当一年“研究生”才能参加研究所的入学考试。这一年也是教授认识你的缓冲期，看看你这个人适不适合做学术研究，程度够不够，个性合不合得来；要是一年当中没能留下好印象，恐怕不必等到入学考试，就得赶紧为自己准备后路。而自己在这一年之内除了考验自己是否能适应异地生活，也可认清究竟对选择的道路是否真有兴趣；不过一般人只求能早日进入研究室成为正式生，并不太考虑其他问题，既是如此，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加强自己的语文能力及专业知识等——这是关于学业部分，更大的一个挑战是如何适应异地生活及照顾自己的心情。

住在离学校五分钟车程的“熊本大学国际交流会馆”，这是专供留学生住宿的宿舍。约有四十多间单人房，还有几间夫

妇房和家族房。三四坪的小房间内附带卫浴设备、厨房，甚至还有暖气和小冰箱，堪称麻雀虽小、五脏俱全，对于初次出门的海外游子而言，是相当令人满意的环境，尤其一个月约台币七百元的租金，更令人对住的方面无可挑剔。

说来可笑，千里迢迢从台湾背来五斤白米、二十罐罐头和一些日常用品，准备不花一毛钱也能活一个月。这也难怪，家贫如洗的我，能到物价指数居全球之冠的东瀛留学，无疑是仅次于逃难的一大人生考验。很难解释我为何执意选择一条苦行僧的道路，天大的抱负与理想在未实践之前只是一个借口，自认也真的没什么壮志才情，只是很想很想这样做而已。

去学校选一些课，听说比较文学这个讲座迄今尚未收过台湾留学生，在背负着“开疆拓土”的神圣使命之下，战战兢兢地交出第一学年的选课单：国语学概论、国文学概论、小泉八云的文学、比较文学概论、和汉比较文学诸问题、本朝文粹。

由于对英文仍然“旧情难忘”，特别加选了一堂由剑桥大学教授主讲的“英诗”，另外也去中文系旁听一门杂剧《窦娥冤》，反正第一年不算学分也没有参加考试的义务，只要明年考研究所之前交出一篇“研究生小论文”即可。我准备写《〈万叶集〉与〈诗经〉的比较》，从“渡河”的问题下手。

最令我头疼的是我指导教授金原理先生开的《本朝文粹》。这是一本日本平安朝的汉文书籍，虽然都是汉字，但是搞那些音读训读，再用日文解释一些玄虚艰涩的典故，实在令我望而却步。可是自己教授的课又不能不捧场，在抱着姑且去“滥竽充数”的心理下，曲曲折折来到小组发表专用的小教室，

等待留学生涯的第一堂课。

五分钟过后，没有半个学生进来，正狐疑自己是不是走错教室时，教授抱着大大小小的讲义降临。他一看只有我一个外国留学生傻楞楞地坐在里面发呆，丝毫不以为忤地笑着对我说，这堂课向来被学生视为畏途而不敢捧场，这学年恐怕也只有我一个人独撑大局，干脆到他研究室上课比较自在。我连忙站起来称是，却发现自己早已手脚发软，自忖这下糟了，完全要原形毕露、自暴其短，这样一对一的“家教课”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。

于是第二次上《本朝文粹》时，我便学乖了不少，除了事前准备的发表资料再请中文系的前田君帮我过目之外，我也不得不“不顾羞耻”地拿出新买的迷你收录音机，当场录下所有上课内容。说“不顾羞耻”，是因为有一名大陆公费留学生讥讽我说：“哟，你们台湾学生的程度这么差呀！还得录下来听，你别丢脸了。”基于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的明训之下，我暂且忍下这口气不跟她一般见识，然而在同时我也立下誓愿，一定要在这三年之中好好念书以雪前耻。不过至今我仍不认为这种自认勤奋好学的举动有什么丢脸的，至少由于我的勇气可嘉，也使原先不明了我程度的教授知道我还算是个有心向学的学生。

2

留学生专用的“国际交流会馆”，像个小小联合国，经常有各色人种的留学生穿梭其内。但是三分之一强的学生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，所以被戏称为“China Town”（“中国城”）。我住在四楼最右端的房间，隔壁是一位纽西兰女孩苏珊。苏珊虽称不上是金发美女，但是爽朗健康的个性很得人缘，常常看到她房间内高朋满座，加上她喜欢烹饪，没事就做个披萨或巧克力饼干等，使得我这老饕庆幸自己得此芳邻。可是苏珊最令人钦佩的还是体育方面的造诣，听说她以前是网球国手，每天不是慢跑个几小时，就是到学校打几场篮球。我曾经有一次和她一起去爬会馆附近的立田山，只见她健步如飞，如履平地，我在后面气喘如牛，挥汗如雨，最后只好告诉她不必等我一起先爬上山顶。等我满头大汗地到达山顶公园时，她却精神奕奕地大做健美操，还问我是不是马上可以跑下山。自从知道她的体能实力后，我当然避免再和她一起做这种“死亡游戏”。

可能是因为校方考虑到女孩子比较娇弱，所以五楼一律住着身强体健的男性同胞，借着迎新会也认识了美国来的约翰、菲律宾的沙米和斯里兰卡的西西尔，他们三人都是领日本文部省奖学金的学生，很自然地结为死党，同进同出。约翰不像一般高头大马的美国佬，反而有些苍白短小，左脚不良于行，不过幽默感仍是跑不掉的。沙米英文够罩，姣好的五官使人并不在意他略为矮小的身材，听说他屡次对苏珊示好，无奈落花无意。至于西西尔，浓浓的斯里兰卡腔英文，听得很吃力，他每次一见到我就会很热情地说：

“Grace give me some grace.”（Grace 是我的英文名字，中文是优雅、可爱的意思。）

和西西尔虽然言语沟通上比较困难，但是仍然可以体会出他真挚的一面。像他生日那天，他请了一伙人到家里做客，说他要煮道地的斯里兰卡咖喱请大家品尝，向来对咖喱敬谢不敏的我，当然视个人喜好于度外，和大家一起去捧个人场。到了他房间，桌上已摆满七八道佳肴，我想除了咖喱之外应该总有些不辣的东西，谁知道定睛一看，每道盘子内装的都是黏稠稠的咖喱，只是颜色深浅不同而已。西西尔还很热心地一一解释每道菜的名称及做法，他说他为了准备今天这顿丰盛的晚餐，特别请家乡的朋友寄了许多材料来，事前也试做了好多次，希望大家满意。大伙儿当然齐声叫好，个个吃得津津有味，我想美味与否仍是其次，西西尔这样一个大男孩，在家里或许从来不曾下过厨房，为了异国朋友，肯绑上围裙一个人闷在房里搞了两三天，这份心意才是大家所赞许的。

参加迎新会时意外获得一份打工的机会。我隔壁正好坐着一位韩国留学生，他已在鹿儿岛大学修完硕士，现在来熊本大学修博士，想要学中文，问我肯不肯教，我当然一口就答应下来——固然收入不多，总是一个好的开始。这位韩国人姓金，后来我都叫他金博士。

少不了要介绍一些自己的同胞。熊大的台湾留学生不多，研究所和大学部加起来最多不超过十位。绝大多数是女孩子，因为人数很少，所以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侨生，只要是会说国语的，大都处得不错。甚至后来谱出恋曲、走入地毯彼端的例子也时有所闻。不过后来我发现一件事，留学生当中最难相处的还是自己的同胞，中国人背后互揭短长，争名夺利的劣根性在海外依旧毫不逊色，任何场所都会有小圈圈产生。想要保持中立一如我的人，往往又是被诉苦最多的对象，走到哪里似乎都有一位扮演广播电台台长角色的人存在，于是你常常会听到张三跟你抱怨李四考上研究所是送了二十万红包，李四跟你透露王五至少和两三名男子有一腿，王五跟你诉苦赵六成绩那么差竟然可以拿到奖学金，赵六气急败坏地告诉你张三一天到晚在背后说他坏话，到了最后，你也会发现这些人口中相传的主角可能就是你自己，不知道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是否存在，至少在小小的熊本地区是如火如荼地展开。

台湾人和大陆人之间的相处是很微妙的，像是一对同胞孪生兄弟，自小被送到不同的家庭收养，一位家境贫寒、历经风霜，一位环境优渥、娇生惯养，长大后突然相见，面貌相仿但气质与思想却有极大的差异。身为外省人第二代的我常常

也困于当台湾人好、还是当大陆人好的矛盾之中，因为这两种“人”在日本是明显被区分的。“中国大陆”历史悠久，地大物博，但贫穷落后；“台湾”生活富庶，经济繁荣，但历史文化均不能与五千年文明古国相提并论。在“属地不属国”的心理前提下，大部分的台湾留学生都会自然而坚决地站在“台湾”的立场，不仅主观意识如此，客观环境更使得你不得不做“二选一”的决定。普遍喜欢和“大陆人”接近的外国人，是仰慕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，又认定中国大陆以其民主开放的脚步及庞大的人口数字，在不久的将来必定能领导群伦，举足轻重。而喜欢和“台湾人”接近的外国人，则是觉得台湾经济实力不容忽视，台湾学生在资本主义陶养下，也比较开放活泼，容易打成一片。别人既已为你的角色定位，自己更必须严守岗位，克尽己责。要是打着“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”的旗帜的话，首先要费尽唇舌解释自己的大中国理论，再细细分析当前台湾两岸关系的发展，最后不忘加一句“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”之类的警世通言，别人可能早已流露出“痴人说梦”的同情眼神，或赞叹国民党教育的成功。我也曾在搞不清客观事实的状况下，向海内外同胞慷慨激昂地发表我的陋论，结果落得“张秋瑾”的外号，自此以后便安分守己地当台湾人。而要完全摒弃中国人情结还真不容易，你会碰到许多令你瞠目结舌的问题，诸如：

“你不是台湾人吗？怎么会说中国话？是不是大学里修的第二外语？”

“你怎么会研究古典文学？台湾才四百年历史，你们有什

么古典文学可言？”

“你研究中国古典和日本古典文学的比较？二者都是外国的东西，会不会很吃力？”

“台湾在哪里？你们的标准语是什么？是英语、台湾话还是广东话？”

“台湾以前是日本的殖民地，你们有今天，一半也是我们的功劳。”

“你们地方那么小，难怪积极地和中國大陸拉拢，他们那么小，你们一定很羡慕吧！”

“国民党从来就不是共产党的对手，香港完了以后，就轮到你们了。”

“我比较喜欢你们台湾人，大陆人穷得要命，一点知识都没有。”

“日本还是比台湾进步吧！你是不是也想来这嫁日本人，以后可以留在日本？”

“台湾有没有生鱼片？有没有味噌汤？你们也用筷子呀！好新奇！”

“台湾当局已经四十年了，你们现在的总统叫什么来着？”

在日本，已经领略到日人对台独后的反应，不管你赞不赞成台独，基本上，意识或行动都不得不配合别人所认定的道路走，常常觉得满头大汗、力不从心，但是对大部分的台湾留学生而言，似乎很容易进入状况，这反而令我觉得自己是异类，只好把大门关起来，乖乖念我的书，不要再去与别人共商国家大事。

3

留日必须找一位日籍保证人开具证明书，保证你在日本的经济情况没有问题，也不会在日本为非作歹等等。保证人的资格必须是日籍，每年有一定数额以上的纳税证明。大部分人就近要求自己的指导教授挎刀，或利用各种亲友关系介绍。我在日本举目无亲，教授也不熟，不好意思开口，因为日本人相当在意当保证人一事，虽部分只是形式，但对毫不相识，或不清楚底细的学生，骤然签订保证书，的确是一难事。在无计可施之下，求助于高我二届的如南学姐，她比我早来熊本，在民俗学学科当研究生，据说她的保证人也是以前的学姐介绍，我当然也如法炮制一番。于是她请她的保证人——一对从台湾来的庄姓夫妇做我的保证人，使我顺利完成留日手续。庄先生也是熊大校友，医学部毕业，赴日已二十余年，现于久留米医院担任副院长，已归化日籍。多亏他的帮忙，使在熊大的四位留学生都受他的羽翼保护，而且刚到日本头一个月，行李都还

没到，连棉被都没有，是庄太太特别向寝具店租了一个月的全套寝具，送到我住的房间，否则恐怕我得捱过一段风餐露宿的日子。

一个人生活，食衣住行当中我觉得最困难的便是如何解决民生问题。印象中的日本料理不外乎寿司、生鱼片、茶碗蒸等，但实际上小吃店卖的多是拉面、乌龙面、定食等，怎么吃都觉得不合胃口，价钱也不经济，只得挽起衣袖，大模大样地自己煮将起来。说起煮饭，实令人汗颜，到底什么菜该放葱，什么菜需放姜我都搞不太清楚，这下可好，带来的食谱研究了半天仍做不出一道像样的菜。火大起来，干脆和起面，包些馅饼、饺子什么的，反而还能下肚。每天光是烦恼三餐吃什么，就足以令人白了头发。也才知道当一个纯家庭主妇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学校为了照顾新入学的留学生，设立了“家教制”(tutor 家庭教师)，请同一研究室的一位学长(或学姐)指导一位留学生，不论是课业上或生活习惯上有任何问题，均可向其请教，而且文部省(日本教育部)支付家教每月一万日币的家教费，这的确是一项立意颇佳的措施。我的家教老师是高我一年级的武藤桂子小姐。她虽大我一届，年龄却比我小两岁，主修丹麦文学，以安徒生作品为主，问她为什么选择安徒生，她说小时候就爱上他的人鱼故事，自然而然想研究他的作品，但是熊本没有教授丹麦文的老师，大部分的书她必须自己研读，而且兴趣和研究是两回事，一切有趣的故事一旦进入研究领域，多半会变得索然无味。我想到自己也是因为爱死中国古典文

学，所以选择中日古典比较的路子，不知到头来会不会跟她一样有所微言。桂子娇小玲珑，说起话来有几分稚气未脱的感觉，但是看得出来比一般传统日本女子思想要深刻些，当她侃侃而谈自己为什么进研究所及谈到自己未来的抱负时，已经树立起另一代日本新女性的形象——独立有主见仍不失温柔婉约；我要是男人，也会以日本女人为选择对象时的第一顺位。

日本大学的体制和台湾略有不同，台湾的大学每一年级的课程是固定且独立的，每一班至少也有四五十人；在熊大，文学部内有哲学科、地域科学科、史学科、文学科等五个学科（相当于系），学科下又细分各个“讲座（course）”，如文学科下有国语国文学讲座、英语英文学、比较文学、言语学、德文、法文、中文等不同讲座，每个讲座各有其专属研究室，像一个小图书馆，平常同学们在里面查资料、交流或上小型发表课。一个讲座的总人数也不过几十人，换句话说每一年级平均下来不过十余人，大学部生在规定的四年修业年限内，修满学分即可毕业，不限定一定科目（除了指导教授的必修课之外），所以你也可以跨讲座修学分，形成一门课二、三、四年级一起上，或是不同讲座的学生一起上一门课等情形，所以我常英文、中文、国文、比文四个研究室乱窜，第一年反正不算学分，不必考试，我就贪心地每个研究室都去插一脚，不过当然是跟自己的研究多少有些关连，否则浪费太多时间反而得不偿失。

比较文学研究室中有两位专任老师，一位是汉学大师金原理教授（即我的指导教师），一位是以西洋文学比较研究为

主的西成彦副教授。西老师的夫人乃是日本赫赫有名的女诗人——伊藤比吕美女士，两人简直是珠联璧合。西老师才三十出头，堪称青年才俊，他与一般学者形象大异其趣，东京大学出身，艺术家气质浓厚，反应奇快，在学生之间颇得人缘。我初进研究室时根本认不出他是老师，还以为是哪一届风流倜傥的学长呢！据说倾心于他的学生不在少数，像我的家教老师桂子私下也透露曾暗恋过他一阵子。有这么一位活泼开朗的专任老师坐阵，研究室内经常是高朋满座、笑声连连，只是他浓浓的大阪腔日文，听得有些吃力，第一年修他的“小泉八云文学”，看的是英文讲义，用的是日文报告，一年下来，课没听多少，语文倒是增进不少。

研究室的龙头老大金原老师则与西老师大相径庭，五十出头，微微发福的体态会使人误以为他是一位严肃、不苟言笑的老学究。其实不然，金原老师专治日本平安朝汉文与和歌，曾赴大陆讲学，除了自己的专攻之外，余暇还在学习中文与法文，好学的精神令后生晚辈望尘莫及。他是第一次收台湾的研究生，之前也不知我会是什么样的凶神恶煞，因此刚与他联络时，不如我预期的热络，私下也很担心被拒，但是见了面之后，他不遗余力地指导我，反而令我有受宠若惊之感。他先带我到文学部事务所和事务员打了招呼（研究室钥匙由此处保管），又带我到国文学研究室，告诉我一些常用的工具书及参考书籍，最后还复印了一大堆研究论文和报告，要我有时仔细阅读；或许是那一年只有我一位研究生，就算是扶不起的阿斗，也勉强死马当活马医了。

如南学姐第一年进的是国语学讲座，但是并没有通过研究所考试，因而转到民俗学讲座去。由于她的败北，使我们当年进去的四名台湾留学生忧心忡忡，不知是否也会惨遭滑铁卢。如南其实是熊大留学生中相当用功的一位，常常可以在图书馆看到她一人在埋头苦读。有人说是她的对手太强，正巧当年和她一起考研究所的外国留学生，是一位大陆来的日文讲师，日文造诣很深；又有人说是因为她的教授左倾，不中意她等等。的确近几年来台湾留学生要进日本的研究所更形困难，不仅面临大陆、韩国学生庞大的压力，而且越来越少的教授肯接纳台湾学生，当研究生都投诉无门，更遑论进研究所。即使侥幸进入讲座忝为一员，谁也不敢保证一年后教授对你采取何种态度。日人的态度常令国人觉得难以捉摸，不论是同学朋友相处，或是师生关系的建立，都必须花一段时间揣摩才会有所心得。

除了日本人暧昧不明的言行令人困扰之外，许多风俗习惯也令同为东方人的我们感到不可思议。在日本社会中，普遍还存在有男尊女卑等封建观念，同时阶级意识也非常明显。以一个小小的研究室来说，学长学弟的上下关系不容打破，低年级的同学帮高年级的同学倒茶烧水是理所当然的事；学长和学弟一起吃饭，付费也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刚进研究室时，由于身分“卑微”，当然端茶倒水的工作便落在我头上，但是一开始不了解这种行规，又认为外国人应该享有“豁免权”，便采取观望的态度，以不变应万变。起先同学们都很好心地教我各种器具的摆位，有时也会礼貌性地不让我动手，几次之后，